



传统典籍中有关西夏音乐、建筑、 礼制等类史料概说*

胡玉冰

摘要: 研究西夏音乐、建筑、礼制等问题,出土西夏文文献、西夏考古资料等无疑是基础材料。同时,在传统典籍中,也散见有相关资料,但长期以来,学者很少对此类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本文从音乐、建筑、服饰、工艺、物产、礼制等六个方面来梳理汉籍中与西夏有关的史料,以期对学者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 传统典籍 西夏史料

本文所述“传统典籍”主要是指由宋、辽、金、元、明、清等六朝人用汉文编写的各种典籍,简称汉籍。按古典目录学四部分类法来类分,与西夏国有关的汉籍多见存于史、子、集诸部。从各部文献史料所反映的内容看,与西夏国有关之汉籍所载内容中以西夏军事、政治类史料居多,艺术、礼制类史料相对比较匮乏,且散见于文献中,没有专题的材料。有鉴于此,笔者拟从音乐、建筑、服饰、工艺、物产、礼制等六个方面来梳理汉籍中与西夏有关的史料,以期对学者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能有所帮助。由西夏国人编著的各种西夏文文献及其他资料中与文化艺术有关之史料有关学者已有专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故本文对这些资料只泛泛提及,不做展开分析。

一、西夏音乐类史料

西夏国曾设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番汉乐人院”,西夏音乐类史料在西夏国原始文献中有较为丰富的记载。如《文海》、《圣立义海》、《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文献中都有音乐类词汇或释文,特别是《杂字》之“音乐部第九”,记载了多个西夏音乐专门词汇。另外,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乐伎图也是研究西夏音乐不可多得的图像文献。黑水城出土的一个西夏乐器构造图,更是不可多得的西夏音乐研究文献。^①

有关西夏音乐的汉文资料,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二三、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辽史》卷一一五《西夏纪》、《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但史料内容非常简单,甚至仅仅是片言只语,很难由此类资料获知西夏音乐的全貌。汉籍中对西夏音乐记载最为详细者是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西夏书事》卷十二景祐四年(1037)秋七月条:“夏州沿党项蕃俗,自赤辞臣唐,始习尊卑跪拜诸仪。而其音乐,尚以琵琶,击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XTQ00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NCET—08—0873

① 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467页。

岳为节。禧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搥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鼙栗、桃皮、茄、笛为器。历五代入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迨德明内附，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视中国为不足法，谓野利仁荣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缠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①在这条史料中，吴广成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夏音乐产生之源、常用乐器、音乐特点等问题，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勾勒了相对清晰的线条。学者研究指出：“从极有限的史籍和文献记载看，音乐融汇在党项羌的战争生活、民俗生活、宗教生活的诸多方面，作为党项羌民族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统一意志的重要手段。”^②

二、西夏建筑类史料

研究西夏建筑，最为可靠的资料当是各种现存的西夏建筑遗迹如西夏陵园建筑、西夏寺庙、佛塔等，这需要运用科学考古发掘的方法来深入进行资料的积累。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修筑于西夏时期的洞窟亦可作为特殊形式的西夏建筑进行研究。西夏国原始文献如《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与建筑有关的词汇也是研究西夏建筑最可靠的一手材料，《天圣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中的法律条文为研究西夏皇室宫殿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史料。^③

从汉籍来看，宁夏、陕西、甘肃等省区某些方志中记载有部分西夏建筑遗迹的史料，梳理这些史料，可以加深我们对西夏建筑的认识和了解，也可为考察西夏遗迹提供一些线索。如明朝朱楠《宁夏志》为我们研究明朝西夏建筑遗迹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宁夏在明朝均属于九边重镇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两宋时期，宁夏曾是西夏国的统治中心区域，所以修宁夏方志，就不能回避西夏统治过的这段历史。朱楠修宁夏志书时就注意到了宁夏历史上的这段西夏时期，从相关文献中辑录了一批西夏史料编入到《宁夏志》中，如卷上《山川》述贺兰山，言及“山多松，堪栋梁之用，夏城官私庐舍咸赖以用。”^④这说明了西夏建筑取材的特点。《古迹》提到了朱楠时代尚存的西夏遗迹，有元昊宫室、李王避暑宫等，《古迹》载：“李王避暑宫，在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极高处。宫墙尚存，构木为台，年深崩摧。洪武间，朽木中铁钉长一二尺者往往有之，人时有拾得者。”^⑤介绍了宫殿建筑的方位、所用材料以及在明朝的遗存情况。《寺观》部分提到“夏时旧寺”承天寺，还提及在承天寺“草间得一断碑”。更值得一提的是，朱楠将残存的碑文过录在本书卷下，即著名的《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顶骨舍利轨》（又名《承天寺碑记》）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这两篇文献在现存的其它各种宁夏通志中基本都有收录。《承天寺碑记》对研究西夏承天寺营建史及西夏宗教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史料价值更高，尤其其所录碣阴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监葬舍利臣刘仁勘，都大勾当、修塔司同监葬舍利、讲经论沙门事臣定惠”句是其它宁夏志书中缺录的。朱楠在叙事中不忘宁夏是西夏故地这一历史事实，多处提到与西夏相关的史事，甚至在《杂志》部分开始系统整理西夏历史，这些都被其后编修宁夏方志者所继承并发扬。如胡汝砺编修《（弘治）宁夏新志》时作《拓跋夏考证》，专考西夏历史，显然是受了朱楠的启发的影响。另外有些材料是直接将《宁夏志》中材料稍作删改后就移录到自己编修的志书中，如两志在《古迹》中均记了李元昊的避暑宫。胡汝砺对此条史料略加删改，在《（弘治）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古迹》中这样记载：“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⑥后者的记

① 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清）吴广成编，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 146 页。

② 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年，第 30 页。

③ 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533 页。

④ 吴忠礼《宁夏志笺证》，（明）朱楠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45 页。

⑤ 吴忠礼《宁夏志笺证》，（明）朱楠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96 页。

⑥ 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72 册，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245—246 页。

述显然没有前者的内容丰富。再如,《乾隆宁夏府志》卷四《地理·古迹》载:“元昊故宫,在贺兰山之东,有遗址。又振武门内,有元昊避暑宫,明洪武初遗址尚存,后改为清宁观。广武西大佛寺口,亦有元昊避暑宫。”^①这类资料对于研究西夏建筑遗迹的沿革显然很有价值。

从曾为西夏故地的陕西、甘肃地方志书中也可以梳理出若干残存于陕西、甘肃一带与西夏有关的遗迹资料。如《陕西通志》卷七一《陵墓》记载:“榆林府榆林县。宋李彝昌墓。在卫北十里红石碛。旧传李继迁葬其祖彝昌,障水别流,而凿石为穴以葬,及葬毕,仍引水流于故道,今俗传墓在水中石穴。夏元昊祖墓。在城西南十里王墓山,有断碑,字已磨灭,相传为夏元昊祖墓。”^②《甘肃通志》卷十二《甘州府》载:“宝觉寺,在城西南隅,旧名卧佛寺,夏国建。明永乐九年修,十七年赐今额。”卷二三《古迹·宁夏府·宝丰县》载:“省嵬城,在县省嵬山下西南,去府一百四十里,西夏所筑。”^③另外,《甘肃通志》卷六、卷二三还有西夏起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元昊筑离宫于贺兰山以游宴的记载。对这类方志中记载的与西夏建筑遗址有关的资料进行梳理,对西夏建筑遗址的考察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西夏服饰类史料

西夏国典籍《杂字》、《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中与服饰有关的词汇可以作为基本的、原始且可靠的西夏服饰类史料来拓展研究。西夏文本《圣立义海》卷八正文佚失,从目录看,主要内容记“皇太后、皇帝法服,皇后法服,太子法服,嫔妃法服,宦宰法服,朝服,常服,便服,茶酒,食。”^④《天圣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载有西夏法律规定的官民服饰,卷十《司序行文门》记载西夏官府机构中有“织绢院”、“作首饰院”。^⑤在李范文等编《西夏文杂字研究》、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等著作中均有利用西夏文文献研究西夏服饰的相关成果,亦可参见。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绘成或塑成于西夏时期的壁画、塑像,以及武威、黑水城等地出土的西夏美术文献更是研究西夏服饰要关注的史料。

汉籍中西夏服饰方面的资料以《长编》记载最详。《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1034)冬十月,“赵元昊自袭封,即为反计,多招纳亡命,峻诛杀,以兵法部勒诸羌。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顶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其伪官分文武,或靴、笏、幞头;或冠金帖镂冠,绯衣,金涂银黑束带,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纸冠,间起云银帖纸冠,余皆秃发,耳重环,紫旋襴,六垂束带,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鞬,乘鲛皮鞍,垂红纓,打跨钹拂。民庶衣青绿,用此以别贵贱。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⑥元人编修的《宋史》所载西夏服饰资料主要从《长编》中取材。如卷四八五《夏国传》载:“其官分文武班,……。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鞬,马乘鲛皮鞍,垂红纓,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⑦此外,宋人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也载有西夏服饰资料:“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⑧

研究西夏服饰文化特点,当将上述各种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西夏国原始资料当然是最可靠的一手资料,但汉籍中所载的资料也不可忽视。在西夏文服饰资料释读过程中,汉籍资料或许可以为某些西夏文服饰词汇的释读提供新的思考角度。而图像资料可以为我们准确了解西夏服饰特点提供直接

① [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乾隆宁夏府志》,陈明猷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6页。

② [清]刘昫等监修《陕西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③ [清]许容等监修《甘肃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 (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⑤ 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2—283,第364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册5,第2704页。参见《隆平集》卷20《夏国传》,《东都事略》卷5《仁宗本纪》、卷127《西夏传》,《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⑦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册40,第13993页。

⑧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3页。

的、可视的材料，将抽象的文字记载形象化。

四、西夏工艺技术类史料

汉籍中有关西夏工艺技术类的史料比较少见。比较重要的如宋人康輿之著《昨梦录》记载：“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尤且健劲。其近弣黑者谓之后醺，近稍、近弣俱黑而弓面黄者谓之玉腰^①，夏人常杂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时镇江裨将王诏遇有鬻犀带者，无他文，但峰峦高低，绕人腰围耳。索价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为弓则贵，为他则不足道耳。”^②另有托名为太平老人所著的宋代笔记《袖中锦》载，夏国剑与契丹鞍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长编》卷一三二载，宋庆历元年（1041）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贤院、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国之所长，非外蕃可及。今贼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自京赍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国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专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请下逐处，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刚甲，旋发赴缘边，先用八九斗力弓试射，以观透箭深浅而赏罚之。闻太祖朝旧甲绝为精好，但岁久断绽，乞且穿贯三五万联，均给四路，亦足以御敌也。”^③正是由于西夏兵器制造技术的先进，才引起了宋朝大臣的担心，也促使宋朝兵器制造技术的改进。从出土的西夏兵器文物来看，西夏国制造兵器的技艺的确是非常高超的，宋人的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五、西夏物产类史料

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圣立义海》等典籍中有大量的与物产有关的词汇。从分析汉籍所载的西夏与宋朝经贸往来活动可以了解到西夏国物产情况。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缁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獐羚角、礞砂、柴胡、苾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④卷四八五《夏国传》载：“乾兴元年，加纯诚功臣。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枝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纓、複，遣内臣就赐之。又遣阁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⑤从这些材料来看，西夏常常是用其地方土特产来交换宋朝所产的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物资，甚至一些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也要从宋朝设置的榷场中购买。而宋朝对于西夏的这些举措在宋夏关系缓和时期是听之任之的。如《华阳集》卷十九《赐夏国主乞买物诏》：“诏夏国主：省所奏买幞头、帽子并红鞓腰带衬等物件，乞从今后，凡有买卖，特降指挥，无令艰阻以闻事，具悉。善纂前修，遯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体乃驰诚，勤于向化，特从俞允，用洽眷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驿所依例收买应付。”^⑥

从记载西夏与周边政权朝贡活动的资料中也可以了解到西夏物产的一些情况。如《契丹国志》卷

① 案：“黄”原脱，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郭》卷34上、《古今说海》卷94转引《昨梦录》补。

② [宋]康輿之：《昨梦录》，《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之《宋代笔记小说》本，周光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册17，第376页。参见元陶宗仪撰《说郭》卷34上、明陆楫编《古今说海》卷94。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册6，第3137页。参见《诸臣奏议》卷132《上仁宗兵策十四事（田况撰）》，《太平治迹统类》卷8《仁宗经制西夏要略》、卷30《兵制损益》，《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1庆历元年六月条，《历代名臣奏议》卷325。

④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册13，第4563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册40，第13992页。案：《宋史》卷326《康德輿传》系赐冬服事于天圣年间。见《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册30，第10536页。

⑥ [宋]王珪《华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参见《宋大诏令集》卷234《四裔·西夏·赐夏国主乞买物诏》，系降诏时间为“嘉祐七年”，中华书局1962年，第912页。案：俞，《宋大诏令集》作“开”；付，《宋大诏令集》作“副”。

二一《外国进贡礼物》载：“每次回赐（新罗国）物件：犀玉腰带二条，细衣二袭，金涂鞍辔马二匹，素鞍辔马五匹，散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细花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数。并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国。……西夏国贡进物件：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二百头，锦绮三百疋，织成锦褥被五匹，苾蓉、甘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回赐除羊外，余与新罗国同，惟玉带改为金带，劳赐人使亦同。”

除汉籍外，个别西文资料中也有关于西夏物产方面的资料，如蒙元时期，意大利马克·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在其《马克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中对一些西夏故地的风土人情做了记叙。如行记第一卷第 57 章《唐古忒州（Tangout）》介绍了曾是西夏故地的沙州的民俗，对当地人焚尸之俗介绍尤详。第 60 章《肃州（Suctur）》、第 61 章《甘州城（Campicion）》和第 62 章《亦集乃路（Edzina）》所记内容对于研究元朝西夏故地的风土人情也有参考价值。第 72 章《额里哈牙国（Egrigaia）》介绍西夏重要城市哈刺善（Calachan）“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①可见，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与外界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他们在默默地为元朝的对外贸易交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六、西夏礼制类史料

有关西夏与周边政权礼制方面的资料，在《宋史》卷一二四《礼志·外国丧礼及入吊仪》，《辽史》卷五〇、卷五一《礼志》中都有记载。《金史》卷三八《外国使入见仪》和《新定夏使仪注》，为我们研究金夏交际之礼提供了基本材料，特别是《新定夏使仪注》记接待夏使之礼和夏使向金国主行礼甚详，从夏使入境到最后赐夏使礼物送其回国，事无巨细，规定得非常仔细。如记夏国使臣到金贺正旦节和万寿节时，有所谓臣使入见仪和上寿仪，按礼的要求，金主就御座后，使臣的动作、语言都要合乎礼的要求，从起立、拜跪、鞠躬、赐酒食、谢宴，等等，规定得非常细致繁琐。卷六〇、卷六一、卷六二《交聘表》记金、西夏、高丽三国间的交际往来，金夏交往的一些史事仅见于此表所记，所记夏使姓氏、官称也是研究西夏姓氏和职官制度的重要材料。清人张澍辑《西夏姓氏录》时有许多西夏人的姓氏就采录于《交聘表》。从史料来源看，《金史》大部分材料均采自金人张瑄所编《大金集礼》卷三九《朝会上》和《人使辞见仪》。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①（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克波罗行纪》，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263 页。